

貴州文史資料選輯

1984 第十五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会 编

vt115/43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五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会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

(第十五辑)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54千字

1984年5月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6,500

书号 11115·66 定价 0.81 元

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

目 录

身世述略.....周素园遗稿 (1)

黔军北伐支湘支鄂始末.....刘莘园遗稿 (25)

记贵州自治学社首任社长张显模.....刘灿文 (44)

清末贞丰仁学会的成立及其影响.....刘灿文 刘灿武 (47)

贵州教育家尹笃生与贵阳师范学校.....肖子有 (50)

解放前贵阳教育概况.....贾功台遗稿 (56)

大夏大学抗战时期在贵州片断回忆.....赖孔贤 (62)

解放战争时期的贵大学运及其领导人史健

.....陈勃如 刘 光 (69)

回忆李晓炎联合龙云谋取贵阳.....刘德一 (86)

我所知道的周、李之战.....王天锡遗稿 (99)

李晓炎入贵阳时的“临时各界维持会”.....文访溪 (104)

黔东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政府斗争纪实.....徐则平 (107)

国民党八十九军组成和起义的情况.....吴行中 (120)

贵州航空史话.....方敦信(129)
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贵州党务.....陈明仙遗稿(133)

“中统”在贵州早期活动内幕.....筱 泉(161)

征收鸦片特税的内幕.....伍效高(169)

贵州银行业概述.....袁树三(176)

贵州银行的点滴回忆.....金泽沛(187)

解放前贵州的货币和货币贬值.....冯程南(191)

回忆刘熙乙经商的历程.....刘裕远(199)

身世述略

周素园 遗稿

周素园先生遗作“身世述略”，系从他散失的遗稿中所得。为尊重作者，对稿中语义不明的字，我们未加更易或增删，仅用“□”予以表明。其余悉照原文。

——编者

我生在一个“破落户”的家庭。幼年教育还是“读书做官，显亲扬名”的那一套。当我成了一名秀才的时候，正是订立“马关条约”的那一年。时局大大地刺激了我，觉得平日所学的，不够应付环境了。于是，变尽方法，觅取新书、新报，如《校邠庐抗议》、《续富国策》、《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日记》、《海国图志》、《万国史记》、《万国公法》、《泰西新史揽要》、《时务报》、《湘学报》等等，颇浏览了不少。我又天生一支笔，叙事持论都明白晓畅，博得观者的同情。按中国传统观念，笔下好的便是人才。因此，社会上很刮目相看。我自己还是感觉不够，想到日本去留学。我家虽薄有田产，每年还靠我教书来补助零用，自费出洋是办不到的；而且父亲老了，不愿我离开身边。后来父亲见背，我去普安厅作幕友。云南巡抚林绍年调任贵州，经过普安，我代我的朋友闵华甫写了一封条陈，说些贵州应办的事，着重的是派遣学生出洋。绍年采纳了，对我的居停方雪岑表示：“闵某人很留心时事，笔下很不错。”他到贵阳接印后，便认真推行这一政策。通令每一

行政区域就地筹款，至少派遣留日学生一名，学习短期师范；停办有名无实的“贵州大学堂”；移动款项，考送留日长期学生二十名，分修各种必要的科目。于是，全省都震动了。我也辞馆诣省，参加考试。

由于华甫的延誉，我很受绅耆的欢迎。那时，收回利权的运动，风靡一时。贵州也创立了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，李苾园先生为总经理，于仲芳先生为副经理，他们延聘我当这公司的总文案。苾园先生在戊戌维新史上，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（李典试广东，拔识梁启超，以其从妹妻之。启超入京会试，馆于李宅，日夜为其师康有为延誉，李亦心折之。遂介绍有为于翁同和。翁向光绪帝推荐，有为遂柄用）；仲芳先生更是热心社会事业的人物（他创办的事业不少，“资善堂”至今犹存）。我当然愿意跟他们学习。而且与考的名单，绍年是委任苾园先生保送，苾园先生要留我，我便不得不牺牲我的愿望了。尤其仲芳先生说得好：“诸葛亮在隆中，不过自修，学成也须求用。你看贵州这一片偌大的荒原，亭台楼阁够你布置得下许许多多，只等工程师来设计画图。就让一百步，斩刈荆棘，平治道路的工作，虽在我们不学无术的人，也还能做的。须知创造历史，还是少不了无名英雄呵！”我被他说服了，不再提游学的事。

路矿公司停顿，我刻意经营了两年。沙漠上开了玫瑰花——贵州第一张日报《黔报》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初八日出版了。形式是四开本，一面印的一大张。内容是社论、电报、新闻、特载、小说，各部门也都应有尽有。编辑由我负责，发行印刷由我老兄周丰原负责。不唯我们一文不拿，还拉了杨石泉、徐伯龙、钱伯良、任志清、李茆田、陈稚苏他们也来帮着尽义务。零售每张制钱十二文，全年四千文。我们是牺牲血本，希望多有

几个读者，把社会知识水准提高起来。给我迎头痛击的是，贵阳许许多多的绅士，看了一天，第二天他们就不要了。我叫送报人给他们解释，我们大赠阅一个月，在此期间是不付代价的。但他们仍然拒绝说：“你们干的好事情，不要连累我们。”没有法子，只好把这班顽固的老先生的大名，从送报簿上摘除了。但另方面却真叫人感动，我收到不计其数的，若远若近的青年们的来信，他们表示：“你说的都是我们想说的话，贵州本是一个盲哑的社会，你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喉舌了。你要维护你的报，发展你的报，不要令我们甬尝生趣，又陷入黑暗和苦闷的深渊里！”他们都热情洋溢地担任推销，担任通讯。所以，三百数十份的销数，也曾达到一千二百份的高点。但报馆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面，我们赤手空拳地玩把戏，只能不拿报馆的钱，再想拿钱帮助报馆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。我预算的广告收入，始终没有生意上门。抬高售价，环境也不许可。年终休刊，仅仅五个月零二十天，已负债六百两（通用银）。在我呢，事前也略有筹划。经过几个月的移步换形，事情已大大变更了。贵阳华延厘，在川盐初改官运的时候，他上辈人抓住了机会，独占“仁”、“綦”两岸的运销，剥削贵州民众三十年，成了百万的大富豪。但他是依靠唐家发财的，所以，唐慰慈办中学的时候，很花了他一笔钱。慰慈曾告诉我：“报馆经费，我叫延厘补助你。”报纸发行后，我在社会上的声望，一天比一天提高，尤其贵州巡抚庞勋菴先生，他确实认我是舆论的代表人，重大事件，不惜殷殷下问，我也知无不言。勋菴先生常把我建议的信函，发交司道会议。慰慈感觉到他所凭借的门荫身分，有被我这个穷光蛋压倒的危险，利用股东权力，屡次干涉我的言论，我也婉言谢绝了。慰慈决心打击我。当报告账目时，补助诺言，他绝口不谈，反而提限制条件，好让我自己关门。

翌年，灯节过去了，出报还没有消息，询问的函件，又从各方面流水一般地堆在我办公桌上。劬菴先生叫人来说，假使愿意的话，报馆经费，官厅可以补助。我反复权衡利害，接受补助，继续出版。这里遇到的困难是：当日热心赞助的朋友，原来都想从报馆得到一点好处，后来看见经济上既没有津贴，名誉上又似乎为我所独占，他们灰心的灰心，高就的高就，答应写文章的都不交稿子了。而我自己呢，起先是一肚子话没地方发泄，出报半年，辞源也渐渐枯竭了，这不用说是由于学问没有根底的缘故。所以，每天在看报、作文、编辑、校对之外，总要腾出一二个钟头读书，充实我贫弱的头脑。但又不能平心静气，从头至尾的一部一部地研究，只可说碰到哪种问题，找哪一类的书参考。没有法子，有时只好用选论、代论的方法来塞责。而且，社会活动展开了，无论是原有的团体，还是新生的团体，都离不开我。开会结果，不管公雅也罢，票选也罢，总给我一个起草员的头衔。拟章程，发宣言，具呈文，一古脑儿包办。应付特种事件，更是虚心求教。我固然乐此不疲，但实在有点应接不暇。还有我一家八口开门“七件”。虽是有了声望名誉，却不能把来当饭吃，只得屈身当了一名公务员。开宗明义，是在劬菴先生直辖的调查局做事。他们评论我：奏稿、公牍都去得，尤其函札，当行出色，要推贵州第一名手。于是，警务公所、谘议局筹办处、学务公所、地方自治筹办处、谘议局，都争相延揽，兼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。虽然此等机关，不一定天天有事办，但时间的分配，也够你踌躇。精力之不复集中于报馆，不待旁人指责，自己也非常抱愧。慰慈恨我入骨，约会股东查账，并要求接办《黔报》。我内省：也该休息休息了。于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六月底，将报馆全盘交出。报馆移交后，尚欠江西人喻增佑的纸账四百余

两。他很慷慨地说：“纸不是周素园自己用，他是印报给众人看的。几百银子算什么！素园倘有急需，我还可以帮助。”此君的高义，令我至今感激。另欠乐良臣的五百两，直至民国十九年我才陆续偿清。

但另一方面，我又参加了政党的活动。这事对贵州民众的利害上和我个人事业的荣枯上，前后数十年间有巨大的关系。纪录始末，我另有专书（拙著《贵州国民党痛史》），这里只描述轮廓罢了。

长沙张石麒，他父亲是贵州的一个中级官僚。他生长在贵阳，我和他不相识。我在上海购买印字机器的时候，我最相信的朋友王子隼来信介绍说：“石麒是很优秀的人物，听我谈起你，他也很倾倒。你回贵阳后，不可不结交这一个朋友。”后来，第一次晤谈，石麒给我的印象还不很深刻。因为我只注意办报，石麒的抱负则计划办政党。他说：“报馆只能算是政党的一部分，有了政党，才能发生大的力量。参与政治，也要以政党领袖的资格而出现。”我说：“你的理想虽高，但不切于实际。我只办你说的一小部分，已经受了无限的艰难困苦。你的企图太大，那有许多的人力、财力供给你！”他说：“人呢，我已随地考查、联络，有了人，不患没有财。我们尽管分头进行，仍需要互相援助。”

石麒真可以，他不断地接洽，不断地说服，《黔报》出版后四个月，他的“自治学社”开成立会了。又经过一年多的筹备，《西南日报》、公立法政学堂也跟着出现了。分社是逐月的推广，社员是大量的增加，到得辛亥革命的前夜，“自治学社”的发展，达到了惊人的数字。石麒有组织的天才，有领袖的容量。他对别人怎样，我不知道，拿我个人说吧，你批评他不对，他诚恳地接受你的意见。有时我甚至发脾气，他还是那样委曲迁就。他说：“你的

事太繁，一切琐琐屑屑都由我去负责。只有党的路线，要你参加决定，党的事业要你尽力维持，应付官厅，应付社会，你须利用你的地位，为党谋生存发展。”我常常是半推半就地、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。这正合着张仪说的话：“吾在术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苏君明矣。”

入辛亥四月后，我们的党渐渐接近受试验的日子了。远一点的是广州党人进攻督署事件（黄花岗之役），近一点的是四川反对铁路国有事件；最近的是贵州陆军小学学生秘密签名事件。我们缜密地讨论过两次，就是党该动呢，不该动呢？要怎样动法？石麒这时显示了他的决心和刚断，发号施令，拚身家性命于一掷。主要策略在于组成新的武装力量，并夺取旧的武装力量。其余多方面的运动，由同志们自愿担任。我分着警界。我是警务公所的老科长，而且敌党——宪政预备会挑拨的谣言常常说：“贵州巡抚是巡警道贺国昌做，巡警道是周素园在做。”说要我运动警界，不如说要我领导警界还适当些。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起义了（今之“双十节”）。跟着是湖南独立，陕西独立，云南独立。我们在兴奋鼓舞中，每一个人都想表现自己的成绩。早起带着头颅出门去，晚餐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回来享受。经过了若干的惊涛骇浪，终于九月十四日推翻清朝政权，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。

军政府合三部分组成：都督专管军事，行政总理主办民政，枢密院赞划军事，指导民政。杨苾诚为都督，石麒为枢密院院长，我便当了行政总理。我又是立法院（谘议局改称）议员，公推枢密员七人之一。从这日起，好象似一条铁链锁我在一间房子里。一张办公桌上，把旧日一院（巡抚）、三司（布政司、提学司、提法司）、两道（巡警道、劝业道）和一二百位秘书、科长、科员分担的职务，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。耳是不断地在听，口是不

断地在说，手是不断地在写；吃一餐饭，也得放下碗筷来酬对两三次；鸡鸣后上床睡觉，还让你披衣起来解决问题。工作的紧张，据我所看到的记载，只有托洛斯基写的《列宁传》，他们在司马尼学院那一段时期神情活像。可惜我们的成就太渺小，出卖的气力和所得的价值是难以相提并论的。

四五个星期过去，诸事渐渐有了头绪，我才注意到各方面。本来，我去当“笨伯”，是让石麒头脑清明，好应付环境。但我们这位百战百胜的将军，却开始踏上失败的途径了。首先，十四日黎明，多数的陆军官佐、陆军学生麇集张宅，拥戴石麒为都督。他们说：“杨蔭诚只是少数士兵临时推举，不经过立法院的承认，他不能算数。”石麒坚决拒绝，以为凡属同志，尽可指挥裕如，何必定要身居其名。复次，和宪政党成立的妥协，不过因为他妨害我们的进行，暂时采取的策略。革命成功后，石麒却提示平分政权的原则，又标榜“积诚感人”的口号。让任志清任枢密院副院长；陈稚苏为枢密院秘书长；郭重光为枢密院高等顾问；刘显世为枢密院军事股主任兼陆军第四团团团长；胡锦涛为保安营统领。机要之地，肘腋之下，布满了敌人的势力。

杨蔭诚为人，简单木强，愚而自用。例如：着手改编，先把他的薙发匠，超升了一名准尉。军人恃功骄恣，动辄鸣角整队，提出质问。我们号召秘密党会，编为新巡防队的，也不无轶轨动作。几十年习惯平静生活的小市民，都奔走骇汗，若大乱之将至。敌党抓住机会，尽量的攻击，加重的诬蔑。过去小小斗争中，石麒打击他们的手段，他们都学会了，翻转来打击石麒，而且运之以阴谋，施之以辣手。他们估计自己的力量，生吞不下我们（我们虽然援川北伐，分散了力量，但两两对比，他们还是处于劣势）。秘密迎请客军，利用戴戡、熊范舆、刘显治和蔡锷接

近，在中间怂恿穿插，许给蔡锷种种优越条件。只要打倒自治党，他们甘心出卖贵州。我们也得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情报，石麒总给他一个不相信。那时当做的事情是派遣代表去云南访问蔡锷。无事呢，联络联络，怀疑吧，解释解释。即使解释无效，亦可证实他对我们的态度。这一点普通常识，我们那时都想不到，真是活该（各省间派遣代表，那时虽没有先例，但自我作□，是可以的）。

酝酿复酝酿，军政府改组的期间迫近了（临时军政府时间三个月，是公布全省的）。立法院规定的每县选举议员二名，也陆续来省报到。敌党恐怕议员集会，正式选举石麒为都督，等不及外兵压境，他们冒险发难了。刘显世半生的生活是寝馈于巡防队，旧式军人都和他有相当联系，又得他们后台老板大富豪的援助，投下巨额资本，他运用金钱收买不稳分子。新旧巡防总统黄蕬卿，是忠实的自治党员，而且在革命过程中有大功。但他却是刑名幕友出身，不懂军事。东路新巡防队哨官唐灿章，强占良民妇为妻，蕬卿声言要尽法惩治。分统谭德骥也惴惴震恐。显世教唆他们叛变。

腊月十五日，谭、唐作乱，戕蕬卿，分兵围扑张宅。石麒幸免，呼援于代理都督赵德全（杨苾诚先已率部北伐）。德全也是加入自治党的，但他却希望当正式都督，利于石麒之失败，拒绝了石麒的要求。于是，南路新巡防分统陈守廉，拥卫石麒出奔。自治党任职的要员，逃避的逃避，藏匿的藏匿。只有我，害了一场伤寒病，躺在家里床上，静听着满城枪声，恭候刽子手的光临。奇怪！叛徒不来。第二天，自称“贵州人民代表”的敌党郭重光，却登门造请了。他说：“张、黄一切措施，种种不满人意，他们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先生卓越的才干，丰富的经验，正大的立场，

贵州没有一个不感佩的。今天，贵州陷于无政府的状况，无论如何，要请你出来维持。”我毅然拒绝了。但他三番五次地来纠缠，而且态度表现得异常诚恳。我自己考虑，在健康上，不能自由活动；在经济上，更是腰无半文。没奈何，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又来再作“冯妇”。于是，扶病会晤赵德全。他说：“过去办不好，由于组织不善，最后的毛病是互相牵制。现在改组，是依据‘耆老会’

（郭重光所代表的团体）提出的方案，采用各省现行制，由都督统辖军民。民政我全然外行，请你当都督参议长，负指导民政的责任。”我说：“不管过去也罢，未来也罢，问题重心不在民政，而在军政。”他也谈了些如何整顿、如何布置的意见，又谈到应付敌党。我说：“我最不放心的是云南北伐军。好在中央政府成立了，我们应该电呈孙大总统，揭穿邻省侵略的野心。中央需要云南军队呢，请催促前进；用不着，请制止他，回滇。不许来贵州捣乱。”马上拟稿交给德全。他皱眉说：“近来本省、外省的电杆常被匪徒刨掘、砍断。你的意思很好，电文甚么时候能使总统看到，却成疑问。”

我第二度组织机关，选任熟练职员。事情还没有上轨道，客军到达贵阳了。德全派人办招待，送犒劳物品。他们表示：“休息三天，兼程东下。”翌晨拂晓，他们自由迁扎东山、螺蛳山一带，尽据城外形胜，架设大炮，以都督府为目标。袁的美敦书虽还没有提出，司马昭之心，却是路人皆知了。德全和我商量，援川第一团几次严电调回，他们迟迟其行，已落敌人后着。因为争权夺利，糜烂地方，也不是好事。要我和郭重光交涉，愿意和平退让。重光说：“滇军预定的步骤是先礼后兵，日内必有条件正式提出，都督果能容纳，决无问题。”我归报德全，德全坦然不疑。

相距六七个钟头，真是口血未干，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三日的

夜半，滇军进攻了。保安营开门纳之，敌军径扑都督府，德全踉跄逃出。自治党夺取的政权，至是全部灰灭。此后便魔鬼登场，进入一个恐怖时期。他们坑陆军，屠杀巡防队，省内省外的自治党员也逐日被逮捕、诛戮。我蜷伏寓庐，每日听到的只是“杀！杀！杀！”

我虽仗声望名誉的保护，估量他们还不敢骤下毒手，但精神上的痛苦和日用上的熬煎，真叫人无法忍受。山妻病已垂危，医药也不凑手。感谢仲芳先生，他了解我的环境，曾当着我的面，吩咐他公子说，“你给周先生送两石米、二百两银子去。”公子虽唯唯承命，背地里却沮格不行。忽然一名工友送来伪都督府一封公文，由寇酋唐继尧署名，委任我为石阡府知府。我勃然大怒，命将原封带回。任志清叫他的高足沈泽鸣、高凤翥一再的来恐吓说，滇军很怀疑我，是他替我解释。我再这样倔强，他也无能为力。我告诉他们：“转达贵老师，猫儿哭老鼠，用不着假惺惺，刀砍枪毙，反正周素园只有一个头，静候处置罢了。”

山妻物故，仲芳先生送我一片地，在次南门外五里关，我去相度了一次，送葬又走了一遭。仲芳先生告诉我：“你两次出城办什么事，我是知道的。但他们的侦探报告，却说你约会赵德全密谋，破坏秩序”。我说：“他们的情报，都可作如是观。”仲芳先生凄然不语。我也警觉到：近日我寓庐的前前后后，常发现一些鬼头鬼脑、伸伸缩缩的人。我那时往来的是一班前朝的官僚，旧日的同事，他们让我学习搓“麻将”，消遣消遣。我的技术并不高明，却是每战必胜，赢了一笔不小的数目，除了支持家用，发送亡妻外，还余一百五十两，来作亡命的川资。

大约是三月十八九吧，我忽动了访友之兴，去找彭明之。乐群学堂里的人说，他好几天没来。转到他家里，家人也报言外

出。后明之看准了是我，才出来招待。他形色仓皇，一见我开口便问：“你没会着李小谷呀！”我答：“你话里含的什么意义？”明之详细申说：“你近日不理外事，杨蔭诚到了南京，孙总统任命他为贵州都督，叫他率部旋黔。杨已电告唐继尧，令滇军退回。另方面，统一党领袖章炳麟、张謇、汤寿潜有信来，请你和蔡衡武、乐彩澄、周铭久们组织贵州支部。戴戡、何麟书主张杀你，郭重光说：‘前杀一钟昌祚，惹起舆论激昂的反抗，况周素园他又无瑕可指，不如叫人控告他们财政不清。凡榜上有名的，一起收在模范监狱，待和杨部决战后，再讨论他们的死活。’群小一致决议，照这样办。”我问：“你的消息确不确？”明之答：“乐群学生吴积诚当了刘显世的一名副官，开会时他站在背后，听得一字不差。我一得信，就请小谷转达你，让你好善筹防卫。”我于是决计亡命。不消三四个钟头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念及仲芳先生，不可不一为话别。把所得消息都告诉了他，并说：“我按站行走，至少须十日以外才能出贵州界。到处都布满天罗地网，他们只消一个电报，要怎样便怎样，我不怕死，但却不愿意死在贵阳，让人家说周素园为公众谋利益，只落得这样一种结果。人们将借鉴覆车，以后没有人肯当笨汉。”仲芳先生说：“据我看，目前你离开贵阳，他们也许暂时缓和下来。我见着他们，只说你被小儿女累得慌，回毕节续弦去。这是很合理的谎言。”彼此珍重握手。这位英毅诚挚的老前辈，从此和我永诀了。

一个月后，我得了重庆镇守府的帮助，发了一封通电，把贵州两党的历史、革命的经过、客军和土豪里应外合的奸谋，详细披露。要求全国正当地评判，想争回我党已失的名誉。嗣后，在武汉，在北京，都依此目的而进行。重要文件，十之八九由我创稿（见拙著《素园书牍》第四卷），曾经有两次把敌人政权动摇

了。一是中央简放赵均腾为贵州宣慰使；一是临时参议院提出弹劾刘显世的议案。敌党也勾心斗角地对付我们。不幸得很，他们是拥着地盘在说话；我们只是抱着义愤在说话。在一班势利奴才的眼光中，显然有轻重之不同了。但袁政府也曾优恤了黄菲卿，优恤了赵德全。敌党指目的土匪首领，中央煌煌表彰，他们一丝气也不敢出。世凯又允许我们查办唐继尧，查办刘显世。但接着宋案发生，二次革命爆发，形势大大变换了。自称老同盟会的唐继尧，一交倒在世凯的怀抱里，东路出兵压迫谭延闿，北路出兵攻击熊克武，替世凯宣力效忠。世凯也允许为他铲锄我们（“黔人冤愤团”的四名干事都明令通缉）。我们本带着“贵州匪党”的“雅号”，又加上“全国乱党”的新衔，立刻成为“双重罪人”。戴戡来电报一次，刘显世来公文一次，要求把我递解回籍。还好，国务院总理熊希龄，耳熟于贵州党争的事实，给他一个不理睬。

我回到四川，在重庆住了一个时期，又迁徙泸县，又迁徙合川。常常接到警告，叫你不能安居。终于三年九月挈眷到达汉口，伏匿在租界里。同乡王季和在那里经商，他恳切地挽留我，说生活不成问题。我便一直待到洪宪改元的时候。我的儿子夭折了，继室又死亡，剩下四个女儿，愁颜相对，家庭幸福我是无份的。政治活动呢，东京的朋友们来信招邀，我实在无兴趣参加。

张石麒在上海，得到了陈英士的倚信，分担一部分责任。他叫冷用民、黄幼甫来接我，带来可怜的旅费，我还是懒洋洋的。第二天，冷、黄又来说：“明晚有船开上海，已经给你买了房舱票，我们还要到宜昌有任务，去不去请你自决。”我只得答应去。

石麒安顿我在湖南人罗杰家里，为的是和他寓庐相近，可以随时商量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性情，不喜欢东奔西跑的。陈英士的职务太烦剧，需要一个很精细的人帮助他。我介绍你，他表示